

人口史研究

清代中期的人口迁移

徐 辉

【内容摘要】 清代中期的一个多世纪里,由于越来越严重的人口压力,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大规模、旷日持久、以自发性为主的人口迁移。人口迁移的种类主要有农垦型、商贩型和工匠及佣工型,各类迁移的方向、规模和社会影响,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产生了广泛的社会经济效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压力、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城镇化、促进了人口的合理分布和文化传播,同时还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人口迁移活动也导致了破坏生态环境以及发生土著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冲突等负面影响。

【作者简介】 徐辉,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清代中期,即乾隆、嘉庆、道光三朝(1736~1850)的110多年里,在人口空前急剧增长,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发生了全国性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本文拟对该时期人口迁移的原因、各类迁移的情形以及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些粗线述论,以期引起人口学界对历史人口迁移现象的深入研究。

1 人口压力下的迁移

在农业社会,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即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耕地面积扩大速度,导致人均耕地面积递减,剩余人口大量增加。清代中期我国人口压力空前增大,兹从人口和耕地两方面的变化分述之。

1.1 人口增长情况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90多年的休养生息,中国人口已由清政权入关时的5000多万增长到乾隆六年(1741)的1.43亿人。此时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史称“乾隆盛世”。人口自然生育获得适宜的外界条件,于是产生了迅速滋生,数量激增的后果。此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突破了2亿,又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超过了3亿,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时全国人口数已达到3.13亿人。终乾隆一朝(六年至五十九年),中国净增人口1.69亿,平均每年增加320万人左右,增长率为14.89%。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之后的嘉庆、道光时期,人口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其间由于农民起义及自然灾害的影响,有些年份还出现过人口负增长现象,但总趋势还是不断上升。道光十四年(1834)突破了4亿大关,持续到咸丰二年(1852)人口数达到4.39亿人。这个数字是有清一代全国人口数的颠峰。此后直至辛亥革命清政权终结,60年里中国人口停止了高速增长,始终在4亿上下徘徊。

1.2 耕地变化情况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全国册籍登记的田土是549余万顷,百年之后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已增加到了780万余顷,约增加了42%。可是,同一时期人口数却翻了一番多,由近9570万人增加到了2.86亿人。可见人口的增长与土地资源开发的严重失衡。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耕地和人口数字^①,可算出清代前、中期若干年份的人均耕地面积:

年 份	耕 地 (顷)	人 口 (人)	人均耕地面积 (亩/人)
顺治十八年 (1661)	5 493 576	95 688 260	5.74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6 078 430	101 708 690	5.97
雍正二年 (1724)	7 236 327	127 550 575	5.67
乾隆十八年 (1753)	7 352 218	183 678 259	4.00
乾隆三十一年 (1766)	7 807 290	208 095 796	3.75
乾隆四十九年 (1784)	7 605 694	286 321 307	2.66
嘉庆十七年 (1812)	7 889 256	333 700 560	2.36
道光二年 (1822)	7 562 102	372 457 539	2.03
咸丰元年 (1851)	7 562 857	432 164 047	1.75

资料来源：注释①

从表列数字可以看出，在雍正二年（1724）以前的 60 多年里，田土的增扩和人口的增长基本上成比例，人均耕地面积有增减但幅度不大。而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人均耕地面积减至 4 亩。明末清初的杨履园曾估计：“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⑤即人均须 3.3 至 5 亩（平均 4.15 亩），才可维持生计。乾隆年间的洪亮吉则认为，“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但可得生计矣”^⑥。从时人的判断可知，人均耕地面积 4 亩，是当时农业生产水平下，全国人口总体维持基本生活的限度。然而乾隆十八年（1753）后，人均耕地面积连连下降，到咸丰元年（1851 年）时只有 1.75 亩了。这已经到了难以活命的地步！恰于此时爆发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不说完全，至少在极大程度上由于人口压力所致。罗尔纲在 40 年代就曾指出过这点^④。

1.3 人口迁移的“推力”与“拉力”

关于人口膨胀引起土地和粮食的危机，当时的官方文献，地方史志以及私人著述均多有反映，兹举数则：

乾隆帝言：“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从前一人之食，今且二十人食之；其土地所产，仍不能有所增加。”（王先谦：《东华录·乾隆朝》）

盛世滋生人口日众，岁时丰歉各处难一，以有限之田土供日增日广之民食，此所以不能更有多余。（《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

今生齿日繁，谋生者众，使野无旷土，人无游民，地利尽而民力亦困矣。（嘉庆《郴州总志》）卷二十一）

天下田土止有此数，而生齿日繁，斯民虽逢乐岁，生计常苦不足，非民不能谋也。（石韫玉：《独学庐五稿》卷二）

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生齿日繁”必然造成谋生日益困难。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般是就地从事家庭手工业或商业，更多既无手艺又乏本钱的则出卖劳动力受佣于人。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是不愿背井离乡的。比如河南孟县“地窄人稠，按口计地每人不足一亩，通邑男妇惟赖纺织营生糊口”^⑦；湖南巴陵县“十分其民而工商居其四，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十分其力而佣工居其五。”^⑧但是，这些有限的职业终究消化不了越来越多被挤出土地的人口，因而当时常有庞大的失业或半失业队伍存在。时人有云，“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⑨；河南黄河沿岸一带“无业之民千百成群，以做工为生，一呼而集。”^⑩既然在家乡谋生无着，只得走上“求食他乡”的流亡之途。于是从地狭人稠的“狭乡”向相对地广人稀的“宽乡”进发的人口迁移便频频发生。

人口压力可看作是产生人口迁移的“推力”，这是起主导作用的原因。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人口流动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自然成了人口迁移的“拉力”。首先，经过清代前期的文治武功，国家政治局面较为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边疆和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这为大批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迁移准备了有利条件。其次，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前来就业的机会。再次，康熙五十一年（1712）“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元年（1723）“摊丁入亩”两项赋役制度改革施行，使得农民和手工业者获得较以前更多的人身自由，有利于人们向外乡迁移。清代中期的人口迁移就是在这样的“推力”和“拉力”作用下，不可遏制地愈演愈烈。

1.2 各类迁移概况

清代中期人口迁移,按劳动性质或谋生手段来分类,可划分为农垦型迁移、商贩型迁移、工匠及佣工型迁移三大类。兹将各类迁移概况分述如下。

2.1 农垦型迁移

农垦型迁移是指流向边地或山区,开垦土地,务农为生计的人口迁移。这类迁移是清代中期人口迁移的主流,它在全国大范围内持续多年。以下简述各主要迁入地区情形。

2.1.1 东北和蒙古地区

山东、直隶、山西、河南等省的迁移人口,主要流向地域广袤、人口稀少、农耕条件良好的关外东北和外蒙古地区。东北以奉天将军辖区(今辽宁省)迁入人口为最多。该地区顺治十八年(1661)时仅有约2.8万人,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已增至71.3万人,增加了近26倍;咸丰元年(1851)又增至258.2万人,是顺治年间人口数的93倍。^①

在口外蒙古地区,“山东无业贫民,出口往八沟、喇嘛庙等处佣耕度日者难以数计。盖由此等流寓民人在彼耕作得利,藉以成家业者甚多,远近传闻,趋之若鹜,皆不惮数千里挈眷而往。”^②晋西北的清水河地方“原系蒙古草原,所有居民并无土著,大抵内地各州县人民流寓”^③,乾隆初年,该地已有“民人寄寓者十有余万。”^④

2.1.2 新疆地区

清政府对于新疆地区,一直是采取“放垦”政策,即招纳、鼓励无业民户前往垦辟。此举至乾隆中期演为最盛。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连年在外招募户民及内地送往户民”,仅在乌鲁木齐所属即已“共垦有营屯田地三十余万亩”^⑤;乾隆四十四年(1779)甘肃镇番等县户民自愿前往新疆开垦,由各县陆续送往乌鲁木齐,先后两批共3112户^⑥。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到来,形成了“边外近地,编氓之聚族而居,日以加繁”^⑦,以至出现“今看戈壁外,沃壤庶无弃”^⑧的情景。

2.1.3 西南地区

清代中期人口稀少的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也是外来人口迁入较多的地区。

云南在元明两代即有过大规模的兵屯和移民,荒地日渐开辟。到乾隆年间,更有大量外省民户流入落籍,尤以地广人稀的滇西和滇西南为甚。如顺宁府乾隆十五年(1750)有10444户,31704人,到道光十年(1830)已有33419户,121990人,80年间人口翻了近4番,其中大多是“各省及外郡来入籍者。”^⑨临安府“内地民人贸易往来纷如梭织,而楚、粤、蜀、黔各省携眷世居其地,租垦营业者亦几十之三四。”^⑩

贵州在清代中期仍是“地方辽阔,土旷人稀”,因而也成了人口迁移的目的地。迁入者多系四川、两湖的农民。从雍正年间至乾隆中期,贵阳府由原有20926户增加到56436户,安顺府由32867户增加到79925户,均增加了一倍多;思南府更由6630户增至41621户,增加了5倍多。增加户绝大多数是外地迁入的。^⑪

流入广西的外省人口多来自广东,湖南和福建。钦州府地方“雍正初地尚荒而不治,自乾隆以后,外府州县迁居钦者,五倍土著。”^⑫嘉庆初年,梧州、浔州和郁林三府,外省前往“贸易往来及寄居入籍者,几占土著之半。”^⑬道光之际这一带的广东客民,许多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

2.1.4 台湾及东南沿海地区

康熙二十年代清军攻台摧毁郑氏政权时,台湾只有20万人口。此后大陆移民接踵而至,主要是福建、广东沿海的贫苦农民。时人陈述闽人迁台情状:“漳泉内地无籍之民,无田可耕,无工可佣,无食可觅。一到台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温饱,一切农工商贾以及百艺之末,计工受值,率皆倍蓰。”^⑭由于迁移人口不断涌入,台湾人口在清代中期增长十分迅速。乾隆三十四年(1769)已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而渡台者仍源源不绝。”^⑮嘉庆十六年(1811)全台人口已有210万人,而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更增至250万人。^⑯

东南一些近海岛屿或江海冲积滩地因与海防安全相关,清政府不轻于向人民开放,但清代中期无地农民迫于生计,屡屡犯禁潜入岛上开垦旷地。日久既成事实,当局禁亦自弛。如江苏海门、崇明岛、浙江玉环岛、

南田岛、广东珠江三角洲滩地等。鉴于人口日众,当局还在玉环岛上设立了政权机构玉环厅^②,以加强管理。乾隆五十四年(1789)时该岛上已垦田地山塘共19万余亩^③。

2.1.5 内地各省区

内地各省区在清代中期无不人满为患,人地关系日益紧张。为充分开发资源,乾隆五年(1740)朝廷发布了鼓励开垦零星土地的谕令:“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向闻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嗣后凡边省、内地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悉听本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④这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扩大到对大片新垦荒地也免征或少征赋税。这无疑大大助长了穷苦农民开辟山区和偏远荒地的热情。辟山垦荒的人口迁移,比较突出的迁入地者有陕西、两湖地区和福建、浙江、江西地区。

继清初“湖广填四川”余绪,清代中期迁移人口转往邻近四川北部和西部的陕南、鄂西以及湘西等山地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如乾隆四十年代陕南“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⑤到道光初年,该地区“老林之中……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数以百万计。”^⑥鄂西山区也接纳了大量前往开垦的穷民。乾隆年间“郧阳、施南二府所属,向多荒地,近年户口日繁,流寓人众,所在开垦……”^⑦。湘西永顺府山地向为土家族、苗族聚居区,此时也有外地客民迁入,因而人口大增,“客民多系赣、闽、粤诸省百姓”。而地处湘、川、黔边境的永绥厅,其“人民俱内地迁入者。”^⑧

在闽、浙、赣地区,进山垦殖谋生的外来人口被称为“棚民”,“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县山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菁,开炉煅铁,造纸制茹为业。”^⑨福建“延、建诸邑深山中,每有客籍贫民盖茅而居,或治畲田,或种菰,……大抵江西上饶、玉山及浙江之庆元、云和之人多为。”^⑩浙江的一些山区也有外地移民“搭棚开垦,种植仓芦,靛青、蕃薯诸物,以致流民相聚,棚厂满山相望。”^⑪江西的棚民在乾隆年间人数大增,如武宁县就有“自楚来垦山者万余户”^⑫,宁都县由于福建移民的涌入,致使“四关居民数万户,丁口十万计”^⑬,“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⑭乾隆十七年(1752)改县为直隶州,以加强治理。

此外,其他省区特别是省际边界山区地方,都存在着大量类似棚民的迁移人口,如皖南山区就多有“外县民人租赁开垦,搭棚居住”。^⑮两湖地区在清代中期大规模修堤筑垸,垦拓江湖之滨的农田,也招致了大批本地区及闽、粤、赣诸省的迁移人口。^⑯

2.2 商贩型迁移

清代中期“国家承平日久”,在农业经济空前发展的基础上工商业进一步繁荣。与此同步的是人口城镇化也有了新的进展。这些都为过剩的农业人口提供了流动空间。诚如章学诚(1738~1801)所言:“国家生齿浩繁,田畴日辟,农桑本业人余于地,其不能耕种者,不得不逐末谋生。”^⑰当时外出经商的流动人口,南北各地比比皆是。如山东黄县“地狭人稠,故民多逐利四方,往往致富。远适京师,险涉重洋,奉天、吉林万里之地,皆有黄人履迹焉。”^⑱江西安义“田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给,故逐末者众。”^⑲

大量外地客商进入城市开设商号,经营各种商品。象“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店皆山东人。”^⑳又如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所得。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㉑当日大都市的繁华,多赖这些外省商贾的经营。就连一些小城镇,也由于四方商贩的涌入而人户大增。江西景德镇在乾隆年间已是“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之七八,土著居民十之二三。”^㉒而同一时期江苏吴江县盛泽镇“迄今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迹亦且十倍,……舟楫塞港,街道肩摩。”^㉓可见城镇接纳了千千万万来自各方过剩的农村人口,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

甚至边远的僻壤山寨也有为数众多的外来小商贩,风尘仆仆不辞辛劳,以求微利。如贵州松桃厅,“城市乡场,蜀、楚、江西商民居多。”^㉔云南临安府,“其自远方服贾而来者,江西人最多,粤人次之,蜀人又次之。”^㉕福建北部出产茶叶,每年“初春后,筐盈于山,担属于道。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㉖

2.3 工匠及佣工型迁移

清代中期人口迁移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工匠和佣工流向异地城乡,从事手工业或采矿业。如苏州“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民,在苏无家室,总计约有二万余人,”^⑧纸坊中工匠则“悉系江宁、镇江等处人民,而“郡中西城业铜作者不下数千家”,其工匠多来自无锡、金匱等县。”^⑨乾隆十三年(1748)“吉从宁古塔及船厂地方所有商贾、工匠、佣工人等约三四万不等,多系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各省之人。”^⑩城市里服务行业的兴旺,也为大量外来人口提供了谋生出路,象苏州“金阊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几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其他诸“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鹤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⑪全国其他繁华都市,情况也大抵如此。

清代中期各地矿业发展很快。开山采矿也成了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大行业。云南、贵州是当时全国矿业最发达的省份,本地劳动力不足,于是千千万万“矿丁”蜂涌而至,“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⑫贵州“银、铜、黑白铝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不等,游民日聚。”^⑬云南的铜矿规模更大,其“开凿背运,悉赖人工。……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人。”^⑭其他如两湖、两广、江西、福建、四川以及陕南、陕西等省的山区也是如此,矿主“所雇人夫多系外来客民,”^⑮“受雇者皆四方贫瘠。”^⑯

3 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知,清代中期的人口迁移,实质上是一场万众求土地、求粮食、求生存的自发的群众运动。这场规模大、地域广、旷日持久的群众运动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先从正面的影响说起。

3.1 缓解了人口压力

前文已述,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到乾隆十八年(1753)时已降至4亩,并且从此迭降无升。更有甚者,有的省份如安徽、福建、贵州等,从乾隆中叶起人均耕地面积就不足2亩,至嘉庆年间再降到1亩上下。”^⑰那末按照常理,首先是这些省份,乃至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如此紧张的人地关系下必然会发生大规模的饥馑,并因而导致人口锐减。然而事实上清代中期并未发生过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从统计数字上看来如此稠密的人群得以继续生存,而且人口依然生生不已呢?答案如华人学者何炳棣曾指出的,是“长期的超省际移民和大量的开山垦荒。”^⑱如前文所述的农垦型人口迁移,大大地拓展了全国耕地面积(其中有相当多的新垦土地未上报入册),生产了足以维持三四亿人口生命的粮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压力。

3.2 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和人口城镇化

从前文所述商贩型和工匠及佣工型两类人口迁移的情况可以看出,清代中期手工业和商业的空前繁荣,是与大量过剩的农村人口广开谋生之路,从事各项非农产业密切相关的。人口迁移活动改变了旧有的产业结构,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而工商业的发达又为吸纳更多过剩的农业人口提供了空间,两者良性互动。

城镇是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的集中地,工商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城镇数量增多、规模扩大、人口增多的后果,使得人口城镇化程度提高。有学者根据方志记载计算出苏州府所属各县的集、镇数,由明代正德年间的45个至乾隆年间增至100个。^⑲苏州城的规模扩展很大,象阊门外的南濠,明代时“尚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⑳到了乾隆年间已是“人居稠密”、“地值千金”、“百货所集、商贾辐辏”的城市商业区了。苏州“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郊外人民,合之州邑,何啻百万。”^㉑城内10万户,以每户5人计,就有50万人。这在当时的城市是相当大的人口规模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不限江南富庶之地,就连边陲少数民族地区,如乌鲁木齐(前文已述及其地人口迁入情况)。也由“千里空虚,渺无人烟”之处变成了“四达之区”的城市,“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繁荣富庶,甲于关外。”^㉒关于清代中期中国的城镇人口,美国学者G·W·斯金纳尔在本世纪70年代所作的研究中指出,1843年,不包括东北和台湾在内,中国计有城镇人口2072万人,占总人口4.05亿的5.1%,江南地区的城镇人口比重则为7.4%。^㉓台湾学者刘石吉认为斯氏的估计过于保守,他举出乾隆九年(1744)吴江县市镇户数占全县总户数的35%等事例来论证这点。^㉔

3.3 促进了人口的合理分布和文化的传播

人口迁出地区因人口减少、人均耕地面积增加而改善生存条件;迁入地区则因劳动力的增加而加速开发的进程。人口分布因而比原来更趋合理,即地区之间的人口密度差距缩小,自然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开发和利

用。

在清代中期,若干人口多,也是人口主要迁出地的省份,它们的人口数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如乾隆十四年(1749),人口比例最大的前6个省份依次是山东(13.52%)、安徽(12.15%)、江苏(11.81%)、直隶(7.85%)、河南(7.24%)、浙江(6.69%);100年后的道光三十年(1850),这些省份的人口比例变为山东(7.66%)、安徽(8.70%)、江苏(10.21%)、直隶(5.41%)、河南(5.53%)、浙江(6.94%)。除浙江省上升0.25%之外,其余各省都下降了一二个至五六个百分点不等。与此同时,一些主要人口流入地的省份,象奉天、吉林、甘肃、新疆、云南、四川等,人口的相对比例均有所上升。其中上升幅度特别大的是四川,由1.41%上升到了10.21%,与江苏省并列为道光三十年(1850)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⑧这些变化表明,人口迁移使得人口分布不均匀的格局有了很大的改善。

人口迁移伴随着文化传播。清代中期的人口迁移,绝大部分都是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迁往欠发达地区,因而前者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也随之向后者转移。如湖南保靖县,“向来刀耕火种,不用灰粪”,嘉庆中期以后,受“客民”影响,“田土种植,俱不可少灰粪。”^⑨陕西镇安县,当地“农民不甚用力,室鲜盖藏”,“近年湖北人来迁者日众,善于修治田土,里民转相雇觅,四乡景色渐觉改观。”^⑩在文化教育方面,如辽宁岫岩州苏子沟周姓“嘉庆初年从山东蓬莱县迁徙于兹。始以经商起家,继以耕读。有武生员一,文武举各一。”^⑪贵州兴义县“地本苗疆,素无缙绅”,嘉庆初年“流寓之客民日增”,传入了内地读书之风,以至“近多有掇科第登仕版者。”^⑫可见人口迁移客观上起到了缩小地区间技术和文化的差距的作用。

3.4 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清代中期的人口迁移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人口稠密的汉族地区迁往少数民族地区,这样必然会促进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人口融洽。民族人口融合包括地缘上的融合和血缘上的融合。地缘上的融合主要表现为汉族人口迁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从而改变这些地区民族人口的构成。如新疆不少地方“百九聚居城乡,种类最为揉杂。曰汉民、曰缠头、曰汉装回,皆招辑之流民,非土著也。”^⑬贵州兴义县在嘉庆二年(1797)“汉苗户口统计二百八十六寨,三十七屯,一万五百七十五户。内仅五十四寨系苗户,其余……则均属客民。”^⑭

地缘上的融合为异民族之间的通婚创造了条件。尽管清政府颁发过禁止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的法令,但并未真正抑止民族人口通婚的趋势。内蒙古地区由于大量汉民迁入,“汉蒙杂处,互通婚姻,故多杂种。”^⑮湖南湘西地区汉苗通婚也很普遍,山区苗民与迁入的汉民相处多年,“涵濡日深,渐习耕读,……姻娅往来,与汉人声息相通。”^⑯民族人口的融合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无疑有利于巩固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清代中期的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若干地方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和不时发生的土著居民与移民之间的冲突。

3.5 迁移人口的农垦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一些地区迁移人口盲目的农垦活动造成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等严重后果。如陕西汉中的客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至四五年后,土既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祇存石骨,又须寻地垦种。”^⑰在浙江奉化,“棚民垦山播种,山上浮土夹流而下,凝滞江底,……每值秋霖冲激,……大江无所容其停蓄,于是泛滥四溢,入田亩为害禾稼。”^⑱道光初年江苏大水成灾,时人认为“实因上游川、陕、滇、黔等省开垦太多,无业游民到处伐山砍木,种植杂粮。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致停淤接涨。”^⑲诸如此类的记载,多见于当时各地史志。

盲目的农垦活动还造成了一些地区的土地荒漠化。蒙古和奉天接壤处的科尔沁草原,在清初还是“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的好地方。清代中期的大肆开垦中有许多毁林烧荒,滥垦过牧的行为,草原植被遭受破坏,渐渐使得科尔沁草原变成了风沙肆虐的沙漠。又如晋西北的清水河地方,原系蒙古草原,由于滥垦,也造成荒漠化后果,“所垦熟地或被风刮,或被水冲,是以口内招来之民,弃地逃回原籍。”^⑳

3.6 人口迁移导致的“土客”矛盾

以求土谋食为目的的经济性人口迁移,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诸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土著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所谓“主客”冲突。如广东恩平等县“主客积怨已久,无可解释”,此处客民

“原籍皆来自嘉应，其始垦山耕种，佃力为生。土民役使严急，仇怨日积”。咸丰初年，客民乘太平军战乱报复土著，“嗣是土客互相残害，……垂六七年。”^②又如江西棚民租山垦地，“土著仇达豪强之辈多以异籍之民，遇事欺凌。”^③贵州在乾隆年间“每有外来游民往赴力垦，无奈地棍即思攘夺，……以致开垦无成，游民隐忍而去。”^④

主客冲突的主观原因是传统的畛域观念，客观原因是诸如田地产、水利、租佃等方面的矛盾纠葛。这类冲突以及人口迁移过程中产生的其他一些社会矛盾，曾多次导致清政府以危及社会稳定为由，对自发的人口迁移进行压制和禁止。但这些措施往往令行禁不止，收效甚微。

注释

- ① 上文及表中耕地和人口数字均转引自孙毓棠等，清代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78：110～120。表中前3个年份的人口数系据人丁数按丁口比1：5推算出
- ② 杨履园先生全集，卷五
- ③ 洪北江诗文集，施闰文甲集
- ④ 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八卷一期
- ⑤ 乾隆孟县志，卷四上
- ⑥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九，巴陵志田赋论
- ⑦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八，户政，养民
- ⑧ 续行水金鉴，卷十二，河山
- ⑨ 各年人口数取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58，262
- ⑩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零九
- ⑪ 光绪新修清水河厅志，卷三十六
- ⑫ 海宁，晋政辑要，卷一
- ⑬ 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一，陈嘉峪关外情形疏
- ⑭ 户部抄档：地丁题本，甘肃四
- ⑮ 椿园氏，新疆记略，卷上，西域闻风录
- ⑯ 洪亮吉，百日赐环集，更生斋诗，卷第二
- ⑰ 光绪顺宁府志，卷十一，食货志一，户口
- ⑱ 江藩源，介亭文集，卷之六，条陈稽查所属夷地事宜
- ⑲ 贺长龄，耐庵奏议存稿，卷五，覆奏汉苗土司各情形折
- ⑳ 道光钦州志，卷一，物产
- ㉑ 孙玉庭，延厘堂集，奏疏卷上，奏陈地方情形疏
- ㉒ 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四，条陈台湾事宜状
- ㉓ 魏源，圣武记，卷八，乾隆三定台湾记
- ㉔ 台湾通志，户役志，经营志
- ㉕ 雍正东华录，卷十二
- ㉖ 户部抄档：地丁题本，浙江四
- ㉗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六十四
- ㉘ 皇清奏议，卷六十四，覆奏民生吏治疏
- ㉙ 清宣宗实录，卷十
- ㉚ 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二十七
- ㉛ 严如煜，苗防备览，卷九下
- ㉜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志九十五，食货一
- ㉝ 郑丽生，闽广记，卷六，棚民
- ㉞ 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二
- ㉟ 乾隆武宁县志，卷十，风俗
- ㊱ 道光赣州府志，卷七十三，艺文
- ㊲ 魏季子文集，卷八，与李邑侯书
- ㊳ 嘉庆黔县志，卷十一，政事
- ㊴ 乾隆长沙府志，卷二十三，政绩
- ㊵ 章氏遗书，卷二十四，湖北通志检存稿

- ④① 光绪山东通志·卷四十·风俗
 ④② 同治安义县志·卷之一·风俗
 ④③ 旧京琐记·卷九
 ④④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嘉应会馆碑记
 ④⑤ 蓝浦·陶说杂编上·卷八·景德镇陶录
 ④⑥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④⑦ 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十
 ④⑧ 嘉庆临安府·卷之七·风俗
 ④⑨ 嘉庆崇安县志·卷之一
 ⑤① 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八册·苏州织造胡凤攀奏
 ⑤②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 1959: 122
 ⑤③ 乾隆盛京通志·卷一百二十九·国朝艺文十五
 ⑤④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
 ⑤⑤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六
 ⑤⑥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一
 ⑤⑦ 卢坤·秦疆治略
 ⑤⑧ 乾隆巩县志·卷七·物产志
 ⑤⑨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394、400
 ⑥① 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104
 ⑥② ⑥③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142, 253~254 ⑥④ 徐熙麟·熙朝新语·卷十六
 ⑥⑤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三·治苏
 ⑥⑥ 椿园氏·新疆纪略卷上·西域闻见录
 ⑥⑦ 转引自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254~255
 ⑥⑧ 上述数字系据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一所载乾隆十四年各省人口数, 以及清户部“清册”载道光三十年各省人口数计算而得
 ⑥⑨ 同治保靖县志·卷二·风俗
 ⑥⑩ 乾隆镇安县志·卷六·风俗
 ⑦① ⑦② 宣统岫岩州乡土志·氏族
 ⑦③ 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十七
 ⑦④ 光绪绥定县志·人类
 ⑦⑤ 光绪蒙古志·卷二·人种
 ⑦⑥ 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清军机处录副奏折
 ⑦⑦ 嘉庆汉中续修府志·卷二十一·风俗
 ⑦⑧ 光绪奉化县志·水利
 ⑦⑨ 陶文毅公全集·卷十
 ⑦⑩ 光绪新修清水河厅志·卷之十四
 ⑧① 郭嵩焘奏稿·肇庆各属土客一案派员驰往办理情形疏
 ⑧② 朱批谕旨·雍正五年七月初八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
 ⑧③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一

(责任编辑: 穆光宗 收稿时间: 1998—07)

Migration in the Mid-Qing Dynasty

The Mid-Qing Dynasty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ensified population pressure which led to massive and long standing migr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Migration types, the underlying causes, and the impact on socio-economy and environment are examined in the paper.

Xu Hui is Ph D. and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Xiamen University.